



Sweden: the Practice and Theories of "Welfare State"

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

——“瑞典病”研究

黄范章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

——“瑞典病”研究

黄范章 著

 商务印书馆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瑞典病”研究 /
黄范章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7-100-12065-4

I. ①瑞… II. ①黄… III. ①福利政策—研究—瑞典
IV. ①D53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876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

——“瑞典病”研究

黄范章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065 - 4

2016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1/4

定价:22.00 元

再版序言

瑞典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显得既陌生又熟悉。说瑞典陌生,其实不然。早在20世纪初叶,以“保皇”和“变法”而蜚声四字的康有为先生就曾流亡到瑞典。1904年,康有为在斯德哥尔摩买下了一座岛,并在岛上建起中式园林,取名“北海草堂”,直到1907年,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在此期间,康先生走访了瑞典不少城乡,参观了监狱和贫民窟,闲暇时到歌剧院、皇宫和公园走走。遗憾的是,作为被记载是20世纪初第三个到瑞典的华人,尽管有着四年多的瑞典旅居生活,康先生却没有留下关于瑞典经济及社会的文字记录以示国人,个中情由也许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说瑞典熟悉,其实也未必。从20世纪初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文革”浩劫、冷战对峙……国人必然无暇顾及他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更何况像瑞典这样一个蕞尔小国,所以对瑞典的关注和研究也只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放眼看世界,尤其是冲破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水火不能相容之思想桎梏,开始从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福利制度的视角去认识政治体制。瑞典虽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却是带有“社会主义特点”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自然成为中国学习和研究的一个典范。然而,尽管今天国人对瑞典的经济及社

2 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

会制度已有所了解,但恐怕只是停留在宜家家居、沃尔沃汽车等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认识的水平之上,因此我们依然有必要深入研究和剖析这个号称福利国家“橱窗”的北欧国家。

黄范章老先生是对瑞典经济及福利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早在1982年他就远赴瑞典,除了与一些科研院所进行学术交流外,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实地考察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以及瑞典经济学的现状。为了真切体会瑞典的医疗保险和保健制度,黄老先生曾亲身体验了一下从挂号到住院的全过程,也曾多次访问养老院,与老人们交谈,以了解老年人保障等问题。这些切身体会加深了他对“福利国家”的认识,也使他掌握了很多一手资料,这一切都可以看出黄老先生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此后几年,黄老先生孜孜不倦地对瑞典经济及福利制度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并同很多瑞典经济学家展开了深入的交流,直到1985年,黄老先生的大作《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一书才得以成稿。从一开始着手对瑞典进行考察和交流,到这本大作的最终问世,足足融入了黄老先生三年多的心血及汗水,也足以看出老一辈经济学家治学的严谨态度和风范。弹指一挥间,30个春秋逝去,但是这本大作依然展示出极强的生命力,被广大学界同人视为研究瑞典福利制度的圭臬,并被要求再版。这种“梅开二度”的源泉在于黄老先生对瑞典经济、政治及福利制度的深刻认识,以及对福利国家潜在危机的远见卓识。果不其然,正如老先生所预见的,瑞典真的于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经济金融危机,并且这种“瑞典病”在21世纪的欧洲国家也暴露无遗。因此,如今我们依然可以从黄老先生《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一书中去探究高福利国家之内在运行机制,并挖掘这种高福利“狂欢”难以掩饰的潜在危机。在此,让我们带着强烈的求知欲去探究瑞典的经济及福利模式。

瑞典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南部,虽偏于一隅,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2013年瑞典人均GDP为57,909美元,排名世界第七。瑞典工业发达且门类繁多,传统重工业地位突出。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同时,瑞典大力发展信息、通信、生物、医药、环保等新兴产业,2014年瑞典已拥有自己的航空业、核工业、汽车制造业、先进的军事工业,以及全球领先的电信业和医药研究能力,在软件开发、微电子、远程通信和光子领域,瑞典也居世界领先地位。从GDP总量来看瑞典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它之所以能吸引全球的目光是因为其以高福利国家的“橱窗”而著称。2013年瑞典的世界幸福指数排名为第五,而所谓的世界大国则被其远远抛于身后,而支撑这些荣耀的即是瑞典的福利制度。

但是,在这本书问世的30年中,瑞典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福利制度发生了一些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瑞典的福利制度建设始于20世纪初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段较长的时期内,瑞典福利制度的发展主要是以扩充和完善为主,并在不断的调整中逐渐走向成熟、定型。然而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瑞典经济增速明显放缓,1977年甚至出现了二战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981年经济再次负增长,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其经济增长明显落后于其他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失业增加,财政状况恶化(财政赤字在1980年高达GNP的12%),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整个20世纪70年代,瑞典经济各年通胀率都在6%之上,其中,1977年、1978年、1980年和1981年通胀率均超过了两位数,分别为11.4%、10%、13.7%和12.1%,瑞典经济明显陷入“滞胀”的困境中,瑞典模式的弊端显露无遗,也意味着其高福利制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为了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只好增加税收或发行国债。增税使得瑞典成为主要欧洲国家中税率最高的

国家之一,其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一直在 50% 以上。高税收严重挫伤了劳动者工作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私企大量向境外转移,导致大量资金外流,而发行国债又使政府背负上沉重的利息负担。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还造成了全社会的过度消费,严重削弱了社会资本形成的能力,生产与投资相对萎缩。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影响了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导致贸易逆差连续出现。高福利和高税收不仅制约了瑞典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其生产率的增长明显下降。在 1973—1981 年间,瑞典的生产率仅增长了 16%(而同期欧共体平均增长了 30%),人均收入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一时间,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还被人们称颂的“瑞典模式”急转直下,成为被世界所诟病的“瑞典病”。在此背景之下,长期支持高福利模式并自 1932 年以来长期执政的社民党在 1976 年的大选中落败,虽 1982 年重新执政,但又在 1991 年再次失去执政地位。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传统劳资协商制度开始动摇,罢工次数增多,社会保障问题更显紧迫。最后,随着社会经济问题的出现,瑞典民众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如在 1968—1979 年间,反对提高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水平者的比例从 42% 增长到 67%,赞成提高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水平者的比例从 51% 下降到 27%,民众对社会保障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正是在上述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下,瑞典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正式启动了福利制度改革。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初瑞典经济危机爆发期间,瑞典针对经济和福利政策的主要改革措施有:第一,适度收紧福利支出。政府通过下调待遇替代率、提高待遇领取资格、增加个人缴费和增加等候时间等措施,使不断增长的社会支出势头得以遏制,社会保障水平的增长趋势开始放缓。1980—1993 年间,瑞典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幅度为主要西欧国家中最低。第二,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1983 年,瑞

典政府颁布了《保健法》，要求各市政府承担规范所有保健服务的主要责任。此后，瑞典政府取消了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的中央集中管理，只负责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资助，而将资金的具体使用权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完全交给地方政府。例如，1990年，政府提出改革老年人和残疾人关怀与服务制度的法案，要求地方政府承担各种有关老年人和残疾人长期性健康关怀和社会服务的责任。法案于1992年实施后产生了一定效果。1993年，接受老年病治疗的人数下降了60%，与老年病相关的病床数减少了13%，地方政府用于老年保健服务方面的支出减少了4.35亿瑞典克朗。受到这一效果的鼓励，瑞典政府又提出对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实行综合性财政资助，资金的使用由地方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自行决定。第三，在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老年服务等领域引入竞争机制。1992年老年服务私营化法令颁布的当年，瑞典增加了270个私营老年护理机构，占瑞典当年老年护理机构的1/3，71个地方政府和6个市政府就老年和儿童照顾与私营社会福利机构签订了协议。1980—1987年间，瑞典接受公共性老年机构帮助的65岁以上老人占养老金领取者的比例从26%降到20%，居住在“老人之家”的65岁以上人数占养老金领取者的比例从41%降到28%。1985—1991年间，居住在“老人之家”的人数下降了30%，长期居住在“老人之家”的人数下降了13%。竞争机制的引入和私营化的发展完善了瑞典的福利制度结构，也提高了制度实施效率。但即使如此，私营化并没有成为后来瑞典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20世纪90年代初期瑞典经济危机的爆发对瑞典的高福利模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并进一步加速了瑞典经济和福利制度的改革。1990—1993年间的瑞典经济危机是自1930年以来最痛苦的时期。从1991年至1993年，瑞典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负增长，GDP

下降了5%，失业率增加了6.5个百分点，达到8%。国民经济直到1994年才开始恢复增长，1995年才回到1990年的水平。这一期间瑞典所实施的改革包括：首先，进一步紧缩财政。在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紧缩短暂奏效后，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瑞典于1991年又一次开始进入财政赤字周期，1993年赤字达到顶峰，直到1998年财政收支才基本恢复平衡。1994年重新执政的社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为期四年的加强公共部门财政的具体节俭计划，1996年实施了一种叫作“支出限制”模式（“spending limit”model）的新的预算程序等。

其次，在紧缩财政支出的同时，瑞典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为改革社会保障缴纳模式，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由之前的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和雇主缴纳改为主要由个人缴纳。这项改革一方面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个人责任。另一项为对养老金制度进行的改革，在瑞典的社会保障中，养老金支出最为庞大，各种养老金支出一一直占50%左右。1998年8月，瑞典将原来现收现付型的养老金筹资模式调整为现收现付型与部分积累型相结合的养老金筹资模式，增加个人账户，并引入名义账户和积累制账户。改革后，瑞典公共养老金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保障养老金”（guaranteed pension），为家计调查型的最低养老金待遇，主要提供给低收入群体，靠一般税收融资；第二层次是名义账户养老金，称为“收入养老金”（income pension）；第三层次为实账积累制养老金，称为“费用养老金”（premium pension）。名义账户养老金和积累制养老金都为收入关联的DC型计划，建立在个人账户基础之上，雇员和雇主的合计缴费为工资的18.5%，其中16%进入名义账户，2.5%进入积累制账户。名义账户部分的缴费资金由四个缓冲基金管理，每支基金接收全部缴费的1/4，并承担1/4的养老金待遇支付。积累制账户分配

的缴费率为 2.5%，这部分缴费资金由积累制“养老金管理局”(简称 PPM)管理，成员自己选择投资基金，由 PPM 转移给市场上竞争的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营。此次养老金改革，对政府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以及代际之间的收入分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养老金制度推出后，瑞典政府又相继对新制度体系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和完善措施：2000 年，新的缓冲基金法放宽了缓冲基金的投资范围；2001 年，政府引入财务自动平衡机制，为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奠定了基础；2002 年运行的收入指数化政策使年金待遇给付机制更加合理。

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的改革也包括了税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1993 年设立了新的个人社会保险税，到 1998 年该项税收已占国民收入的 6.95%。同时，国家收入税和财产税都不同程度增加。由此可见，瑞典财政收入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的增加也基于经济周期的上升和政府税收的增加。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危机中，瑞典的失业率飞速上升，这使政府认识到改革劳动力市场对整个福利改革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实施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这项政策不仅旨在减少失业，也具有潜在的再分配效应。因为一方面，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了免费或极低费用的职业培训，相当于无形中将社会资源转移给他们，以增加他们重新进入正常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另一方面，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还可能以“补贴就业”的形式出现，更加直接体现其社会再分配效应。这项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效果不明显，然而却在长期中大获成功，它对于稳定社会经济和巩固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作用。

进入 21 世纪后，受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瑞典将福利改革的重点集中在降低社会保障费率和继续推进积极的劳动力政策方面。2009 年 1 月起，政府把雇主的社会保障缴费率从 32.42% 降低 1 个百分点至 31.42%（当年合计减负 120 亿瑞典克朗）；对自我雇佣

者的缴费率降低 5 个百分点；将 26 岁以下年轻人的社会保障费率再降低 50% 至 15.49%，以鼓励企业雇佣年轻人；对一年以上长期失业者和福利企业的补助则增加一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减少了失业。2010 年，联合政府连续执政后，一如既往地推进积极的劳动力政策，鼓励年轻人尽快结束学业早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得力的措施缓解了危机对瑞典的冲击，稳定了社会成员的收入和信心，由此产生的良好经济表现成为欧洲各国趋之若鹜的榜样。

虽然历经数次调整和改革，瑞典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与模式特征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依旧为国民提供着“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系统的生活保障，这表明瑞典近 30 年的改革是相当成功的。总结来看，第一，财政整固措施做到了有的放矢。除了紧缩一些不必要的开支外，最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的社保基金缴纳模式和占公共支出近 50% 左右的养老金筹资模式，引入了竞争机制，并实现了个人、雇主和政府共同承担福利融资责任，弥补了原有福利制度的缺陷，减少了福利浪费，并有效降低了财政支出。第二，优化完善了税负结构，对个人和企业税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激发了个人参与劳动的热情和责任心，也激发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第三，加大了对研发和公共教育的投入。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至今，瑞典的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为 3.6% 左右，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公共教育开支占 GDP 的比重保持在 7% 左右，也大大超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两方面的高支出使得瑞典保持了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大量高素质的人才，确保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第四，在调整失业救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劳动力市场，从以往单纯地给予失业救济金，改变为严格领取资格，减少待遇支付，增加资格等待期，强制参加培训，鼓励工作福利和为积极就业提供政策支持等，有效地降低了失业并提高了参与劳动的积极性。

这些改革措施使瑞典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使得高税收和高福利的制度非但未成为累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创新氛围。统计显示,瑞典的公共开支占比已由 1994 年的 34.4% 降到了 2011 年的 27.6%;而且失业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历史最高 9.9% 降到了 2012 年的 7.9%。在 21 世纪初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瑞典不但没有因高福利造成主权债务高筑,而且还因其良好的经济表现而成为欧洲国家引以为傲的模式和发展方向。

虽然瑞典经过 30 年的改革既成功地走出了高福利“陷阱”,又保持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和经济的竞争力,但这种成功并不能为其他国家所轻而易举地复制。因为高福利模式有其内在的弊端,黄老先生从两方面对此进行了清晰透彻的分析:第一个方面是高福利必然导致巨额公共开支和沉重的税务负担;第二个方面是一个深层次的疑问,即如此之高的公共支出以及税负是否可以持续,以及这种模式将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对此,黄老先生在书中也给予了深入解答。一是庞大的财政赤字,二是加剧了通货膨胀,三是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四是经济竞争力减弱。这些判断与瑞典著名经济学家林德贝克(Lindbeck)的观点不谋而合。1994 年林德贝克在其主持编写的《瑞典的转向》一书中提出推动福利改革的 113 条建议,被认为是学术界支持瑞典福利改革的宣言。他认为,瑞典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福利国家与市场经济运行的矛盾,高福利的逆激励效应直接作用于劳动者的劳动、消费者的储蓄和投资者的投资。而这三者恰恰是市场经济保持活力、经济不断增长的基本动力。此后,一些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进一步阐述了高福利对经济的负面作用。高福利的确降低了消费者的储蓄和投资动机。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了公民失业、退休后经济生活水平下

降的风险,于是储蓄的预防性功能降低了。同时,完善的福利制度往往以高额的政府税收来支撑,这将导致可支配收入下降,储蓄动机和潜力进一步下降。此外,高福利对劳动积极性也存在一定的冲击,一些劳动福利制度被认为直接“鼓励”劳动者去享受社会福利,从而导致逆向劳动激励效应。

不幸的是,高福利模式导致的危机在 21 世纪再次爆发,近年来发生的欧债危机就是最好的佐证。

欧债危机发端于“欧猪五国”。除了欧元体制的固有缺陷外,欧式社会的高福利模式也“功不可没”。二战后,欧洲国家普遍建立起了以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保障制度,以维持社会的公平公正。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这种高福利制度也很快覆盖了共同体中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等国,其中希腊最为典型。希腊作为南欧国家,没有在经济水平上赶超其他国家,反倒在欧盟成员国福利政策的带动下,逐步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而这种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的高福利制度加剧了希腊政府的债务负担。高福利支出刚性,使得历届政府为讨好选民,盲目为选民增加福利,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公共债务激增,最终引发了欧洲整体的债务危机。因此,这次危机再次证明了高福利“鸦片”必然造就危机。

在此,我们不得不叹服黄老先生《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一书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预测了高福利国家必然出现危机,而且其对高福利模式系统的研究即使在 30 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谈到此,我们必然会产生一个疑问,政府为什么要实施高福利制度,实施这一制度背后有什么思想和理论的支持,值得欣慰的是黄老先生的书中也给出了答案,即瑞典学派,尤其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瑞典经济学家关于“福利国家”政策的讨论,为瑞典奠定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关于福利经济学的最早的系统性论述当属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庇古之后,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为了缓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形形色色的福利国家论者开始各显神通——从后凯恩斯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从制度学派到瑞典学派,从民主社会主义到混合经济论。尽管各树一帜,别出心裁,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推行改良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补贴,实现“收入均等化”和“充分就业”,消除社会贫困和经济波动,使资本主义制度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关于这些福利经济学的知识,书中有系统的概括和论述,可为广大学者研究福利国家制度提供坚实的理论指导。

最后,对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让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中产阶级发展,建立适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任务的中国而言,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以人为镜才会少犯错误,少走弯路。

徐 忠

2016年2月于北京

序 言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和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都鼓吹社会改良主义,主张由国家来兴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到战后初期(1948 年),以艾德礼为首相的英国工党政府曾宣称英国已建成“福利国家”,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效尤,纷纷以福利国家相标榜。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值得经济理论工作者来具体分析和深入探索,它对全面了解世界经济动态、掌握时代脉搏是有现实意义的。

从历史上看,社会改良主义和福利经济学在西方世界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一方面,垄断资本的势力不断扩张,力求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后,不仅已经争取到选举权和工会的合法地位,并且形成了不可压服的社会力量。拿 19 世纪末的英国来说,阶级斗争的形势已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这对于垄断资本集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费边社”理论家西·韦布夫妇合著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1923 年)一书中,也曾有所揭露。经过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那段“和平”繁荣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若与其他国家的劳苦群众相比,显然已有某种程度的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

缓和阶级矛盾、稳定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1920年)应运而生。作者自称该书的目的在于研究“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实际则是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某些“干预”，采取各种社会改良政策，把垄断资本主义美化为“超阶级”的福利国家。

在庇古之后，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风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暴露无遗，为了“挽狂澜于既倒”，形形色色的福利国家论者就各显神通了。从后凯恩斯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从制度学派到瑞典学派，从民主社会主义到混合经济论，尽管各树一帜，别出心裁，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主张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推行改良主义经济政策，通过各种社会保险和福利补贴，实现“收入均等化”和“充分就业”，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和经济“波动”，使它得以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

所以，所谓福利国家，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矛盾趋于激化、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从本质上看，当代资产阶级各派经济学家所宣扬的种种有关福利国家的理论，都是为了通过推行“三高”(高福利、高消费、高工资)政策，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性质，竭力缓和趋于激化的阶级矛盾，为垄断资本实现最大限度利润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效劳。

当然，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在战后的最终形成和迅速发展，绝不是出自各国金融寡头的“慈心”或“恩赐”，而是迫于当代世界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形势。很明显，战后时期，在欧、亚一些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也开展了争取扩大民主、改善生活待遇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阶级矛盾进一步趋于尖锐。垄断资产阶级害怕“星火燎原”，迅即求助于扩

大社会福利措施,来转移视线,以期平息此起彼伏的群众斗争浪潮。这就提示我们: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赢得的各种福利待遇,跟他们自身的团结合作、坚持斗争是分不开的,也可说是各国工人阶级长期斗争、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发展到一定条件下的产物。

还应该看到,战后的科学技术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特别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使垄断资产阶级的相对剩余价值不断增加,同时也为进一步推行具有社会规模的福利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此外,战后跨国公司畸形发展,属于这些母公司的子公司遍及资本主义世界,海外利润率大大超过国内的平均利润率。垄断资产阶级在获得巨量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以后,就有可能多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来局部地“调整”本国劳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和巩固金融寡头的统治。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70年代初期,随着西方世界陷入“滞胀”的困境,在公共开支猛增、财政赤字庞大、通货膨胀日剧、资本投资疲软、技术更新缓慢、竞争能力削弱的情况下,福利国家制度也走到了反面,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80年代以来,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纷纷提出要对福利主义进行“重新估计”,并且大造舆论,主张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准备向劳动人民经过长期斗争得来的果实开刀。有人硬把西方经济的“滞胀”归咎于推行以“充分就业”为中心的“经济稳定化”政策,甚至归罪于整个社会福利制度,说什么它使“穷人养成依赖性和惰性”,使投资者却步,从而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停滞。这当然是欺世之谈。因为,“滞胀”的根本原因,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在于它是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积累和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国家长期推行“反危机”政策的直接后果。近年来,从美国里根政府到欧洲的英国、联邦德国、荷兰、挪威乃至被称为福利国家